

男性气质理论与经典重释

黄邦福

摘要: 男性气质理论视男性气质为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男性气质的文化表征和文学呈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随着西方经典重释热的升温,学者们运用该理论对菲茨杰拉德及其小说文本中的男性气质问题进行了重释。本文以菲茨杰拉德小说研究为考察对象,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期冀展现完整的批评图景,为国内男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关键词: 男性气质理论;文学经典;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1)9-215-03

作者: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四川,成都 610064

长期以来,性属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女性,性属建构主要是对女性进行标记,而男性(尤其是白人异性恋男性)从总体上讲被当成普遍性的存在而处于隐形状态。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男性运动的兴起,男性气质研究开始进入批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该研究关注男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男性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本质,认为男性气质同女性气质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而非生物学建构,性别观念因此被消移,女性也可能表现出男性气质;作为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是多元化的,包括霸权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男性气质,这些男性气质类型在权力关系上并非是平等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权力结构;男性气质具有表演性,需要得到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的确证,权力和财富是西方男性气质的主要确证物。

20世纪70、80年代的男性气质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生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考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男性气质的文化表征和文学呈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关注现代主义男性作家对于男性气质互为冲突的建构,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主义男性作家在性属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异”。^[1]文学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解读成为文学批评热点,为经典重释提供了新的画面。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他的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成为解读美国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历史性文本,他因此被公认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编年史家”。他的小说也,在漫长的批评历史中,批评家们先后运用新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叙事理论、性属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方法对其小说进行重新阐释。在这些阐释中,性属批评成为当代菲茨杰拉德研究中的明显倾向。本文以菲茨杰拉德小说男性气质研究为考察对象,对西方学界有关菲茨杰拉德及其小说作品中的男性气质研究进行详细的梳理,期冀为这一重要问题展现完整

的批评图景,为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二

作家成长的家庭环境与社会历史环境无疑会对其性属观念的生成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作家与作品内在的密切关系,这种性属观念自然会渗入其作品之中,成为其作品重要的标记特征,因此,男性气质研究的一大关注点就是作家本人的男性气质问题,如安德鲁·罗伯特的《康拉德与男性气质》、玛丽·奥康奈尔的《厄普代克与父权制的困境》。

菲茨杰拉德成长、创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也是美国现代性属观念产生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性属体系,导致了今天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差异的产生。一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职场,承担起传统上由男性承担的角色;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的力量不断增长,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性属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现代化进程中机械的日益采用,使得身体在生产中的作用减弱。这些因素改变了传统的性别权利结构,男性异性恋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在人际关系和权利关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的焦虑。

菲茨杰拉德生活于并见证了这样一个“性别危机”时期,他同当时众多的男性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也经历着男性气质焦虑,并期冀重塑自己的男性气质。布莱斯·特雷斯特将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梅尔维尔等美国作家并列为“正统男性气质的捍卫者”,认为他们对于男性定义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焦虑。^[2]格罗格·弗特梳理了美国男性身份的历史变迁,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美国现代性属的特征,借此历史语境分析了菲茨杰拉德所面临的男性气质危机。^[3]

菲茨杰拉德的男性气质焦虑还源于他本人的女性化男性气质。阅读他的传记资料,我们会明显地发现,他对自己的性属身份抱有的矛盾心理,“既主张男性气质,又坦陈自己的女性气质”^[4],他对自己的性别表演时常感到焦虑,非常害怕自己被人认定为同性恋者。

作为应对,他终生都在为定义并为拥有男性气质而努力,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将某个最具代表性、最出色的男人当成他的英雄,包括足球运动员、作家、政治家,如他自己所言,“我羡慕某个男人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男人。我想扔掉那些给与我个性的外在特质,而成为他那样的男人。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男人;我想吸收他身上的所有引人注目的特质,把它们变成我自己的一部分。”从中我们不难读出,菲茨杰拉德对他的男性气质抱有强烈的焦虑感并为重塑自己的男性气质而不懈努力。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未能深入地分析菲茨杰拉德女性化男性气质的生成原因。格雷格·弗特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弥补了这一缺憾。他采用心理传记方法(Psychobiography)结合菲茨杰拉德的书信与传记,梳理了菲茨杰拉德男性气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与家庭的影响,分析了菲茨杰拉德对现代男性气质怀有强烈的矛盾心理的内在原因。^[5]他指出,菲茨杰拉德女性化男性气质的生成既受到美国现代化转型时期文化女性化背景的影响,同时也与其家庭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菲茨杰拉德拥有一位强势的母亲、弱势的父亲,其母亲对其女性化的装扮及其两位姐姐的去世,都对其女性化男性气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成年后的菲茨杰拉德的男性气质不断地受到娜尔达和海明威的挑战,使其对自己的男性气质感到焦虑,并努力地定义自己的男性气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心理传记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范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学,不是对个体的人生故事进行全面描述,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某些单一事件,用心理学的方法和视角作出说明和解释,它关注的重心不是“是什么”,而是要回答“为什么”,因而可用于分析作家创作思想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不了解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男性气质观念,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问题。因此,充分利用菲茨杰拉德留下的丰富的书信、手稿和笔记,结合其传记,深入挖掘其男性气质观念的生成背景及其变化过程,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问题。

三

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同样,文学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观念也是一种建构,与具体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是男性气质观念的重要载体,男性气质观念的历史与文化变迁通常会蕴涵在文学作品中并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反映。因此,重释经典作品,挖掘其中蕴涵的不同的男性气质观念,以此洞悉男性气质的历史变化信息,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菲茨杰拉德的男性气质焦虑和观念,通过其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作品得以呈现并成为其小说的重要主题。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小说所关注的一大问题就是性别问题,因此,对这一重要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迈克尔·基梅尔所言,“不了解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性属和男性气质问题,就不能读懂他的作品。”^[6]其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男性气质问题,自然成为了批评家们阐释的重心。

有些批评家注意到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焦虑。蒂法尼·约瑟夫运用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对《夜色温柔》中的性属与创伤、创伤与性别表演、创伤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创伤引发了性别表演并对性别表演造成了困扰。^[7]安格莱斯·卡拉比也指出,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男性角色,为了逃避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和焦虑,躲入了纵乐的“喧嚣的20年代”,试图对受到女性威胁的男性气质进行一种浪漫化的建构,以确证其性属身份。^[8]

有些评论家关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女性化男性气质及其原因。凯瑟琳·伯勒斯指出,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男主人公大都多愁善感、性格软弱,“处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的位置”。^[9]究其原因,弗朗西丝·克尔认为菲茨杰拉德“创造雌雄同体的角色和隐喻”是因为这样做“更契合他的感

性与才华”^[10],是某种自传式的呈现;对此,朱迪思·费特利通过对《夜色温柔》中迪克与尼科尔之间支配与从属的权利结构的深入分析,认为女性化的美国文化逼疯了美国男性,迫使他们过着一种女性化的生活,而女性则因男性的这种牺牲而获得了健全的心智。^[11]

更多的评论家则关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同性恋倾向问题。爱德华·瓦西欧莱克指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同性恋题材小说,尼克和盖茨比是同性恋者,尼克爱上了盖茨比,对他抱有性渴望。^[12]对此,弗朗西丝·克尔持不同的看法。她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性属与性别主题置入历史语境,认为该小说是关于情感性属的现代主义艺术对话的一部分,菲茨杰拉德既遵从又拆解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严格的二元对立,指出尼克对麦基先生和盖茨比的同性恋倾向,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过度反应。^[13]

总体上讲,评论家对菲茨杰拉德小说文本中的男性气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但这些研究只是关注菲茨杰拉德的个别小说文本,没有对其五部小说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忽视了其五部小说的内在关系和连续性。事实上,菲茨杰拉德五部长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男性气质具有较为明显的演变性,从《人间天堂》中的阿莫瑞·布莱恩、《漂亮冤家》中的安东尼·佩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杰伊·盖茨比、《夜色温柔》中的迪克·戴弗,到《最后的大亨》中的门罗·施塔尔,这些男主人公构成了一部男性气质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男性气质的变化过程的反映。系统性地研究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问题,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作品,也会为我们提供一幅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问题的完整画面,避免菲茨杰拉德具有“同性恋倾向”或“厌女症”等误读或过度阐释。

其次,现有研究对于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男性气质多样性与表演性的探讨广度和深度不够。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多样化的男性气质世界,既有霸权性男性气质,也有从属性男性气质,还包括同性恋等边缘性男性气质;同时,男性气质也与阶级和种族关系密切。因此,采用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和巴特勒的性属表演理论等相关理论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进行整体考察,探究其小说作品所体现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别政治以及男性自我性别身份的表演性建构,这将是菲茨杰拉德小说男性气质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他笔下的男主人公的身上都有着本人的影子。因此,除了研究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男性气质观念及其小说文本中的男性气质问题之外,有些评论者也将菲茨杰拉德的传记、历史语境与小说文本结合起来,将其个人与社会历史因素对其作品的影响纳入批评视野之中,探究菲茨杰拉德男性气质观念与其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男性气质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吉·科登指出,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建构了不同的同性交往模式,其目的是以质疑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与性属的建构方式,表现出他对男性世界抱有很强的矛盾心理。^[14]凯瑟琳·伯勒斯认为,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往往处于传统上的“女性”地位,说明他并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男性沙文主义者。^[15] 迈克尔·诺林结合菲茨杰拉德本人所面临的严肃艺术家与通俗文学作者之间的矛盾,分析了《夜色温柔》中的迪克·戴弗所面临的类似矛盾,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源于现代主义的诸多矛盾的方面,男性的职业焦虑与身份焦虑与这些矛盾密不可分。^[16] 珀尔·詹姆斯指出,《人间天堂》是对20世纪初期美国男性气质焦虑的一种范式表达,菲茨杰拉德借助于历史,以证明现代主义“女子气新男性”的合理性,并试图复元男性气质。^[17]

小说文本与传记研究相结合,这是菲茨杰拉德小说男性气质研究最为理想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将帮助我们深化对其作品的解读。菲茨杰拉德“既身在其内、又身在其外”,见证了美国现代性属的转型时期,同时对此问题予以了关注和思考。他对自己创作时的状态有着清楚的认识“开始写作时,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我是半女性化的——至少我在心理上是这样。”因此,探讨菲茨杰拉德在其小说中建构女性化男性气质的内在动因,这应该是菲茨杰拉德研究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菲茨杰拉德在其小说世界中营造了多样化的男性气质,是对父权制社会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某种解构,在这个世界里,“父亲”被消解,具有强烈的传统男性气质的汤姆·布坎南也被赋予了“女性化”特征;其笔下弥漫的女性化男性气质,是他面对个人与时代的男性气质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建构与应对策略。

五

国外菲茨杰拉德男性气质研究所探讨的问题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主要包括作者的男性气质、同性恋倾向、男性气质危机、小说人物男性气质的建构、男性气质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性别政治等。但研究文本相对集中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这两部小说。男性气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菲茨杰拉德的男性气质观念自然会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且比较清晰地呈现在他的作品中,因此,对这些小说进行整体性地解读就显得必要。其次,现有研究主要考察菲茨杰拉德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男性气质,较少结合菲茨杰拉德的个人和社会背景;有些研究也涉及到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男性气质问题,但是未能深入地探究其生成的过程,采用心理传记方法,探究菲茨杰拉德本人为什么会形成女性化的男性气质,可以为其作品提供一种较有深度的新的解读。再次,现有研究未能解释菲茨杰拉德在其小说中建构女性化男性气质的内在动因。

(上接80页)

四 结 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产业转移的成功,关键在于适宜产业的转移和承接,实现产业本地化和供应链的本地化,这一过程主要在于产业和供应链资源的融合,促使产业供应链结构升级和优化,做到资源共享,形成资源的再利用和再生,从而达到实现承接地和转出地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否则,即使产业转移能形成一时的成功,却难形成长期的成功,也难以实现可持续稳定地增长和发展,还有可能形成新的资源浪费

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经历了从否定到接受到复兴、从边缘到中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新世纪里,随着经典重释热的逐渐升温,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高涨态势,研究视角与主题日益多元化,但对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这一重要主题,几乎还是一个研究空白。中国学界应借鉴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批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解读,这必将丰富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的内容。同时,菲茨杰拉德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现代化转型时期,探究该历史语境下男性气质的变化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同样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问题,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

[1][3] Greg Forter, “F. Scott Fitzgerald, Modernist Studies, and the Fin-de-Siècle Crisis in Masculinity”, *American Literature*, 78: 2 (2006) 293-323.

[2] Bryce Traister, “Academic Viagra: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52: 2 (2000) 298.

[4][10][13] Frances Kerr, “Feeling ‘Half-Feminine’: 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The Great Gatsby*”, *American Literature* 68 (1996) 405-31.

[5] Greg Forter et. al., eds. *Desire of the Analysts: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Y: NYUP, 2008) 147-75.

[6][8][14] Michael Kimmel & Amy Aronson, eds. *Men and Masculinities* (Calif.: ABC-CLIO, 2004) XVII; 306-309; 334-36.

[7] Tiffany Joseph, “‘Non-Combatant Shell Shock’: Trauma and Gender in F. Scott Fitzgerald’s *Tender Is the Night*.” *NWSA Journal*, 15: 3 (2003) 64-81.

[9][15] Jackson Bryer et. al., eds. *F. Scott Fitzgerald: New Perspectives* (Athens: U of Georgia P, 2000) 51-62.

[11] Judith Fetterley, “Who Killed Dick Diver?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ender Is the Night*.” *Mosaic*, 17: 1 (1984) 111-28.

[12] Edward Wasiolek, “The Sexual Drama of *Nick and Gatsby*”,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9: 1 (1992) 14-22.

[16] Michael Nowlin, “‘The World’s Rarest Work’: Modernism and Masculinity in Fitzgerald’s *Tender Is the Night*.” *College Literature*, Spring 1998: 58-77.

[17] Harold Bloom, ed. *F. Scott Fitzgerald* (NY: Chelsea House, 2006) 203-32.

(责任编辑: 群 喜)

和新的产业结构矛盾。

参考文献:

[1] 张鑫《基于产业集聚的东部产业转移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月。

[2] 马斌《东部产业转移与重庆产业结构优化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3] 叶广宇、蓝海林《供应链分析与基本竞争战略的选择》,《南开管理评论》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南 桥)